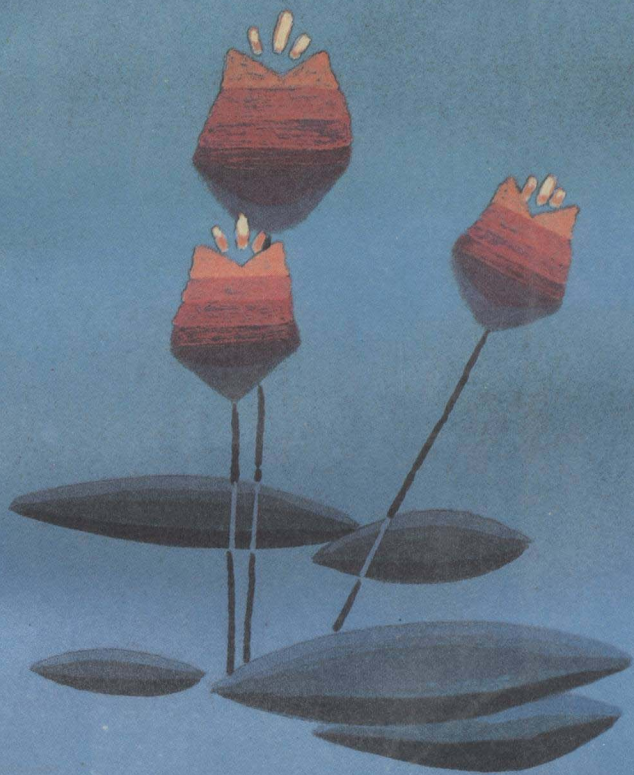


95.11.3

入选《世界名人录》中国作家作品丛书

★茹志鹃 ★沈大力 ★张 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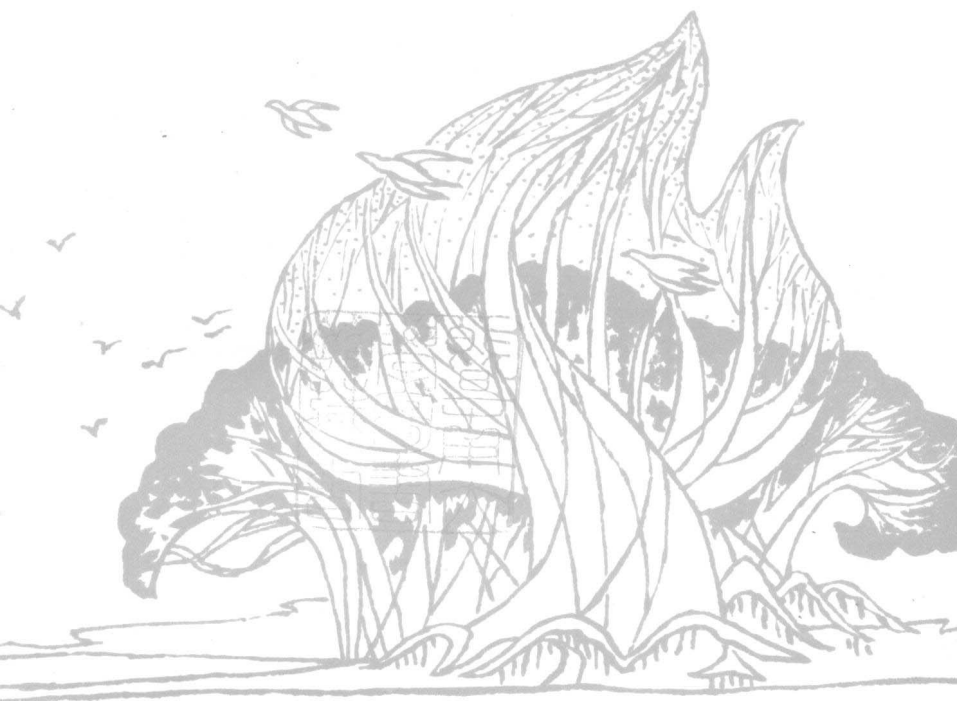


百 合 花

入选《世界名人录》中国作家作品丛书

百合花

★茹志鹃 ★沈大力 ★张洁



1993.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91 号

书名	百合花
作者	茹志鹏、张洁、沈大力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人民卫生出版社胶印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大 32 开本 9.125 印张 205 千字
版次	199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199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0665-9/I·288
定价	7.50 元

目 录

茹志鹃

自传	1
百合花	9
剪辑错了的故事	19

沈大力

作者简介	41
向世界奉上我一瓣心香	42
夜空流星	48
沈大力主要作品目录	155

张洁

作者简介	159
盯梢	160
假如它能够说话	168
你是我灵魂上的朋友.....	172

致友人	181
想起五月的那个下午， 掷进特莱维喷泉的一枚银币	186
过不去的夏天	189
柯先生的白天和夜晚	191
上火	201
张洁主要作品目录	283

茹志鹃

自 传

我是行五，最小的一个，上面四个都是哥哥。1925年旧历9月13日出生在上海。我出生时，家庭已经没落，在杭州老家的房子已经卖掉，祖上开的茧行，也早已歇业，实际上这时的家庭开支，已全靠姨母朱庞氏维持。姨父朱子奎是日本三井银行副董事长之类，当然很有钱。我父亲却是一个赌、嫖、鸦片烟全来的败家子，赋闲在家，什么也不会干，什么也干不了。因此，在我三岁时，母亲因患白喉去世后，姨母看看我家是个填不满的坑，便领了我大哥、三哥两个孩子回去负责抚养，其余的不管了。父亲大概也是怕这个家的重负吧，他孑然一身，不告而别。所以从我记事起，祖母就是我唯一的亲人，她带着我和四哥，来回奔走于沪杭两地。实际上，是来回依赖于上海的姨母和杭州的姑母。而这两位姨姑母，我不知道她们见过面没有，她们却不约而同地玩起踢球游戏来。杭州的姑母家，接近于封建地主的大家，她借口有一位厉害的婆婆，就拼命把我们往上海踢；而上海的姨母则认为我祖母有亲生女儿在杭州，同时自己已负责养活两个孩子了，便硬把我们朝杭州踢。于是我就跟着祖母，乘着三等火车，来回奔于沪杭两地。其实我们要求照顾的，只是我们做工以后，还不够生活的一点

补贴之数，实在是微乎其微。在杭州我跟着祖母糊火柴盒，磨锡泊；在上海则跟着祖母到人家里翻丝棉，做女佣，或坐在一无所有的灶披间里钉钮扣，缝贴边。

十一岁时，我和祖母及四哥住在上海普志小学楼上，就在此校上学一年。这家私立学校，好像是个夫妻店；解放以后，才知道这是钟望阳（笔名苏苏，较早的儿童文学家之一）从事地下工作的一个据点。当时我只知他姓杜，学生都叫他小杜老师，以区别他的父亲老杜老师。

我还记得那时我战战兢兢地坐在他面前，读着“从前有一个农夫……”，这是小杜老师教我的夜学。我一边读着，心里直害怕。这就是我第一次上学的记忆。当然，记忆中也有愉快的事，那就是上小杜老师的爱人张老师的课。张天翼同志的《大林与小林》就是她每天给我们念一节，听了以后引起的那种渴望、新奇、神妙的境界，直至今天我还记得。

我大哥这时已离开了朱家，好像是在美专学习或工作，记得这一年的冬天，他突然来到家里，因为他极少回来，所以大家很意外，结果他说他急需钱用，家里把唯一值钱的东西，也就是我身上的一件棉袄，脱下来去当了钱给他，我呢，只能不出门（这时我们家已搬到普志小学那个弄堂口的一家亭子间了），祖母把家里做饭的那只煤炉拎到房里给我取暖，午后，我只觉头昏、想睡，就趴在床上晕倒了。幸亏四哥有些常识，知道这是煤气中毒，及时打开了门窗，拎出炉子，才免于—死。

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吃紧，我和祖母、四哥又回到杭州，我们在紫阳山脚下一个大杂院里，租到一间房子住下。第二年，亲爱的、唯一的亲人我的祖母就死在这间屋子的阁楼上。从她胃痛开始卧床到去世，将

近一个月时间。在这一个月里，我们没有钱给她看过一次病，服过一次药。死后，姑母推说自己正做月子，连看也没来看她，就出了一点棺材钱，草草把祖母在一荒地埋掉了。直至现在，我都不知道我那亲爱的祖母，那左脚微跛的尸骨，埋于何处。我也不知她的大名，只知道她娘家姓何，和我祖父同是绍兴人，年轻时就守寡，养育了一双儿女，却很不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我因为出了一个小说集，拿到一笔稿费，便和一家人及四哥的一家人去了杭州，重访了那个紫阳山下的大杂院，我们住过的那间房子。房子里正住着一位三轮车工人。经同意后，我们进去看了看，也望了望那个阁楼，那里的家具摆设，和我们当年比较起来，真可算得上是个小小的资产阶级了呢！

祖母死后，姑母更不管我们了。我和四哥的生活，就由在上海一个银行里作练习生的三哥负担，每月寄几块钱来。记得除了买米以外，还可以买些红腐乳当菜。但对孩子来说，当他知道明天确实有饭可吃时，今天饿一顿，去换得另一种“食粮”，是多么乐意而兴奋的事。我就在这种状态下，第一次看到了电影，那片子可能是《荒江女侠》之类。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从隔壁邻居那里借到一部《红楼梦》，我开始背诵里面的诗词，作为自己的课本。

这样安宁的日子过了没有几个月，我三兄的收支不能平衡了，他出于无奈，想了一个办法，就叫我们同来上海。是一个初秋的日子，我们来到上海后，知道我们再也不能有一个家了，兄妹也必须分开。四兄立即进了一家钟表厂做学徒。我呢，挟着唯一的财产——一本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当时我正背着叙利亚每天晚上偷着帮他爸爸做抄写工作，以致自己功课日益下降的那一课）被送进了愚园路上的“以马内利”孤儿

院。这是一个基督教会办的慈善机构，单收女孩，一日三粥，半天读书，半天做工，晚上便像发了疯似的做祷告，有哭的，有喊的，我却是浑身发冷，腿肚子打颤。我怕极了，心里直喊着“奶奶”。记得祖母去世前，姑母曾劝她把我送到尼姑庵去做小沙弥，奶奶不肯，说：“要死让我们死在一道。”如今奶奶不在了，我到底从如来佛的脚下，滚到了上帝的手掌心里来了。不知那时我是从什么书上看得的一句话，叫做“不自由，毋宁死”，我在那个环境里生活了几个月，实在忍不下去了，特别是听到那里面的孩子，一切前途都由院里安排决定，我立即把上面那句话拿来实行，以死来要求院方让我出去。院方无法，就叫来了介绍人，同时也叫来了我三哥。院长按照我入院的协议，要介绍人付清我在院数月的膳宿费。最后他们不知如何协商的，也不知道那位介绍人是否受了损失，结果反正是我三哥苦着脸把我带走了。

出来以后，立即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活下来，住到哪里去？

那时上海环龙路（现在叫雁荡路）上，离法国公园（现在叫复兴公园）大门不远，有一所妇女补习学校，可以住读，入学不必考试，补习的课程也可以由自己挑选。而最好的一点是学费、膳宿费可以按月而不是按学期缴付。收费不算昂贵，但也不很便宜。当时作为一个临时措施，我就住进去了。一间十来个平方的房间，放了三张双层床，一张桌子，两张凳子，如果六个人同时都在房里，那就非得有五个人上床不可。同房间有歇业的舞女，也有从乡下来的小地主的女儿。我在这个学校选了三门课：算术，珠算，簿计。目的是准备找个饭碗。这时我才十四岁。

几个月后，我三哥来缴费的神情，越来越愁苦了。这时我

认识了一位相信基督教的同学，由她介绍，我来到了原清心女中校址，一个美国的女信徒在这里办了一个圣经学校。住宿免费，似乎只收少量饭费。收的也是仅限女生，但这里比之孤儿院自由多了，可以外出，也允许亲人来访，每天还能吃到一顿干饭。唯一的缺点，就是不问你是否相信上帝，主课读的却是圣经。

在这里，上帝大概照顾了我不到一年的光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那位学校的主办人大概觉得耶稣也难以保佑她的安全，就回美国去了。平心而论，她比孤儿院的中国主持人要强多了。她跟同学接近，还爱用花儿的名字给同学起号。在中国，女孩子以花取名，往往是丫头，不知美国如何？从翻译过来的小说中看，仿佛也极少。她回国以后，学校由中国人代理了一个时期，最后在人心紊乱中解散了，我只得暂时寄住到姨母家。这个时期，随着我年龄的增加，深深感到中国无望，自己个人也无望。低头无路可走，抬头望不见一线光明。我绝望了，曾经想走一条绝路，来了结自己短短的一生。

结果，我当然没有死，那时我还不学跳黄浦江，只知道有一种叫“来沙儿”的药，但那药也相当贵，非我所能买得起的。不久，我三哥应姨母家人之召，要去内地，就把我和四哥，一起带往浙江找我大哥。最后就由大哥的朋友辗转介绍，我总算作为沦陷区去的学生，免费在武康县中学，作为初中三年级的插班生读书了。那时我咬牙要尽快拿到一纸中学毕业的文凭，便于出来找碗饭吃，似乎一有文凭就会立即有工作似的。记得在这个学校里，我接触了庐隐的作品，和当时自己的心情结合起来，我很喜欢她的东西。

一年后，我以语文尚好，数理化相当糟的成绩勉强毕业了。这时我四哥早已去上海。我就把得来不易的文凭，缝在衣

服里，回到日占区的上海，住在四哥的一位姓任的女朋友家里。后经任家父亲的介绍，在现在的茂名路上一家私立颐生小学任教。那时小学教师的待遇极低，但由学校供一顿中饭，另外校长再介绍一两个家庭教师的职务，从早忙到晚，勉强图个温饱。就在这时候，我写了《生活》这一篇小速写，寄给了《申报》副刊，没想到竟登出来了。这篇东西我自己都忘了，多亏扬州师院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同志，经过他们细心搜寻，找到了这篇短短的、也是我最早发表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到我对旧社会的愤慨。这一年我正十八岁。

同年冬，已在解放区的大哥寄钱寄信来，叫我们去苏中。当时我对革命并无深的认识，只是考虑到住在人家家里，凉亭虽好，但非久留之地。我就结束了一个学期的教书生涯，随同也在做小学教师的二哥、四哥，以及四哥的爱人，一同来到苏中解放区的盐垦中学。原来这个学校只是一个转接站，我大哥并不在此。我们在盐垦中学迎接了1944年的元旦，便来到苏中二分区，参加到原新四军一师服务团，从此我就有了“家”。

这时尽管敌人“清乡”、“扫荡”得厉害，我这个“家”行动频繁，但我却觉得安宁。我在这个“家”里，也没有过一次工作上的调动，只是单位合并，名称改变。1944年夏，我们团的老同志上党校，上抗大整风学习，我们新同志则上刚刚筹建的苏中公学。1944年冬整风学习后，我便在公学的俱乐部工作。以后俱乐部吸收了原一师服务团、一师文工团的同志演出《甲申三百年祭》，团体也就改为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改编为华中军区文工团。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我们和山东军区文工团合并，改编为华东军区（又称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渡江以后，又改为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名称改来改去，而我始终在这个“家”里，周围是熟

悉的领导、熟悉的同志。1947年4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家”里，我什么都干。既是演员，也是合唱队员；搞过服装、化装，也做过组长、分队长。战时下部队去，做包扎所的护理员，带俘虏，领担架队，搞土改。但我和大家一起做得最多、最经常、也最累人的乃是行军。我曾一边睡觉一边行军，走过平原，走过峡谷边上的羊肠小道，跋涉过沙地也走过长达数里的齐腹水路，走过泥浆路，也走过弹簧似的“橡皮路”，参军第一个冬天，也曾赤脚踏雪行过军。在“家”里，不管道路如何艰难，我都觉得踏实可靠，因为前面有同志，有领导，有广大的群众。我一边行军，一边做过很多梦，而梦得最多的，是在全国胜利后，我有一张床，一架书，当然还得有几椽可以遮风蔽雨的屋顶。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过，这个梦想能否实现，哪怕是在最艰苦的1947年，我们跟随一、四纵队，以及中原突围出来的独立师，进行鲁西南突围时，也没有怀疑过我们的胜利。因为老百姓愿意和我们一起走，一起挨饿，一起分享一张煎饼、一块地瓜。

我爱文学，这是我少年时，在紫阳山下读《红楼梦》时就开始的。不过到了文工团更加发展了这种爱好。在解放战争开始时，我们团离开淮阴，奔赴苏中前线，我一方面剪了一个男孩子的头，准备在参加战斗时可以免去梳头这些琐事，另一方面我却背了四大本的《战争与和平》，这是从一个全家逃走了的地主家里“打游击”弄来的。但是从爱文学到我自己想搞文学创作，这里有个漫长的过程。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1947年，我们在前沿演出贺敬之同志的《白毛女》时的情景，它使我亲眼看到了戏剧文学的力量。我惊叹，慑服，羡慕这种力量。我暗中下了决心，要走这条路。当时，我明确地想要搞创作；敢

于想搞创作，这不能不感谢党，感谢我的“家”。在“家”里，我没有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在“家”里也使我对生活有了比较正确的见解，同时，这个“家”也使我积累了生活。但在当时我并没有发宣言。我觉得发宣言、提要求，都没有实干来得具有说服力，而且自己到底能不能走这条路，也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所以我是在自己的本子上，开始了创作的实践。写诗，日记，追记（因战争环境，事后写的），还写各种各样无以名之的感想、散记、故事，也收集过民歌。还曾经写了一首《跑得凶就打得好》的歌词，得到一次二等奖。1948年，文工团重新成立了创作组，我就被分配在创作组了。

1956年，部队要搞军衔，要搞正规化了，大批女同志转业到地方工作。我也从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调到了上海作协分会办的《文艺月报》社当编辑。在编辑岗位上，坚持业余创作。我自己定了一个三三制，即每夜带孩子睡三小时，闹钟一响，起来写三小时，然后再睡三小时，第二天照样鲜蹦活跳去上班。1959年被吸收为中国作协会员。1960年离开编辑工作搞专业创作。1962年被选为作协上海分会理事。

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不久，即被作为文艺黑线的尖子，在专业组的小组会上进行批判。从三楼挂到底层的大幅标语是：“文艺黑线的‘金字招牌’茹志鹃要老实交代！”1974年上海作协宣告“彻底砸烂”，我被调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艺组。1977年调到上海文联《上海文学》杂志编辑部任编委。同年，被选为上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百合花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

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一开始他就把我撩下几丈远。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噫！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等我紧走慢赶的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蹬的自个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摔下几丈远。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不过这一

次还好，他没让我撩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这时，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有十八岁。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惶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我拼命忍住笑，随便地问他是哪里人。他没回答，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才说清自己是天目山人。原来他还是我的同乡呢！

“在家时你干什么？”

“帮人拖毛竹。”

我朝他宽宽的两肩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绿雾似的竹海，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盘旋而上。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扛了几枝青竹，竹梢长长的拖在他后面，刮打得石级哗哗作响。……这是我多么熟悉的故乡生活啊！我立刻对这位同乡，越加亲热起来。我又

问：

“你多大了？”

“十九。”

“参加革命几年了？”

“一年。”

“你怎么参加革命的？”我问到这里自己觉得这不像是谈话，倒有些像审讯。不过我还是禁不住地要问。

“大军北撤时 * 我自己跟来的。”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娘，爹，弟弟妹妹，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我家里。”

“你还没娶媳妇吧？”

“……”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头，憨憨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我还想问他有没有对象，但看到他这样子，只得把嘴里的话，又咽了下去。

两人闷坐了一会，他开始抬头看看天，又掉过来扫了我一眼，意思是在催我动身。

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他摘了帽子，偷偷地在用毛巾拭汗。这是我的不是，人家走路都没出一滴汗，为了我跟他说话，却害他出了这一头大汗，这都怪我了。

我们到包扎所，已是下午两点钟了。这里离前沿有三里路，包扎所设在一个小学里，大小六个房子组成“品”字形，中间一块空地长了许多野草，显然，小学已有多时不开课了。我

* 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后，共产党为了全国人民实现和平的愿望，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忍痛撤出江南。但时隔不久，国民党竟背信撕毁“双十协定”，又向我中原、苏中等解放区大举进攻。

们到时屋里已有几个卫生员在弄着纱布棉花，满地上都是用砖头垫起来的门板，算作病床。

我们刚到不久，来了一个乡干部，他眼睛熬得通红，用一片硬拍纸插在额前的破毡帽下，低低的遮在眼睛前面挡光。他一肩背枪，一肩挂了一杆秤；左手挎了一篮鸡蛋，右手提了一口大锅，呼哧呼哧地走来。他一边放东西，一边对我们又抱歉又诉苦，一边还喘息地喝着水，同时还从怀里掏出一包饭团来嚼着。我只见他迅速地做着这一切。他说的什么我就没大听清，好像是说什么被子的事，要我们自己去借。我问清了卫生员，原来因为部队上的被子还没发下来，但伤员流了血，非常怕冷，所以就向老百姓去借。哪怕有一二十条棉絮也好。我这时正愁工作插不上手，便自告奋勇讨了这件差事，怕来不及就顺便也请了我那位同乡，请他帮我动员几家再走。他踌躇了一下，便和我一起去了。

我们先到附近一个村子，进村后他向东，我往西，分头去动员。不一会，我已写了三张借条出去，借到两条棉絮，一条被子，手里抱得满满的，心里十分高兴，正准备送回去再来借时，看见通讯员从对面走来，两手还是空空的。

“怎么，没借到？”我觉得这里老百姓觉悟高，又很开通，怎么会没有借到呢？我有点惊奇地问。

“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

“哪一家？你带我去。”我估计一定是他说话不对，说崩了。借不到被子事小，得罪了老百姓影响可不好。我叫他带我去看看。但他执拗地低着头，像钉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声地把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说了。他听了，果然就松松爽爽地带我走了。

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房